

海洋史沙龍素描

劉育信（臺大歷史學研究所碩士生）

陳昀秀（臺大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生）

海洋史沙龍成立於 2008 年，第一年舉行五次，後續的迴響與評價，讓海洋史沙龍工作小組深感努力的成果獲得肯定。

2009 年第一次「海洋史沙龍」，於 4 月 20 日舉行，邀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暨人文社會科學中心海洋史研究專題中心執行長陳國棟教授揭開序幕，講題為「馬尼拉大屠殺與李旦出走日本（1603-1607）」。



▲陳國棟老師（攝於臺大歷史系會議室）

陳老師和臺大歷史系淵源深厚，他和當天與會的楊肅猷老師是大學與研究所同班同學，與沙龍主持人周婉窈老師則是臺大碩士班、美國耶魯大學博士班前後期同學。三位老師齊聚一堂，使得本次海洋史沙龍猶如一場小型的同學會。

陳國棟教授近年來的代表著作有《臺灣的山海經驗》、《東亞海域一千年》，另有數篇致力推廣海洋史研究的演講稿及論文，如〈海洋文化研究的多元特色〉、〈探索臺灣的海洋文化〉等，可說是目前臺灣海洋史研究領域中極富盛名的學者。本次演講內容係根據陳老師即將於 2009 年 9 月發表於《臺灣文獻》的同名論文。

演講開始前，陳老師提及 2007 年與周婉窈、李文良、陳宗仁三位老師，在籌劃「臺灣與海洋亞洲研究領域發展計畫」時，他之所以提議以「沙龍」這種較為開放、輕鬆的方式進行，是想藉由「閒聊」的方式，吸引更多對研究海洋史有興趣的研究同好、師生，並拉近彼此的距離。

接著，進入正題，到底李旦（?-1625）與馬尼拉大屠殺有什麼關係？簡單地說，李旦很可能是 1603 年馬尼拉大屠殺事件之後的華人倖存者，他被西班牙人丟上排櫓船（galley）充當划槳手，在參與 1606 年西班牙人征討摩鹿加的戰役後被釋放，並於 1607 年投奔在日本的（義）兄弟歐華宇（Whaw）。

過去關於李旦的研究，大抵不脫日本學者岩生成一（1900-1988）的研究成果。岩生成一於 1931 至 1932 年間曾在英國抄錄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檔案資料，其中摘錄一段柯

演講摘要

克斯 (Richard Cocks) 在 1616 年所寫的信，當中提及李旦自馬尼拉到日本的故事。陳老師與岩生成一對此件書信的英文理解有所不同，陳老師認為柯克斯在此信件中的敘述，乃是指李旦於「九年前」到日本，由此推算，李旦應在 1607 年抵達日本。至此，讀者或許想到兩個問題：一是李旦到底為何離開馬尼拉轉赴日本？另一則是，就算李旦在 1607 年來到日本，離 1603 年的馬尼拉大屠殺事件已有四年之隔，其中關聯何在？

陳老師指出，在過往的研究中，沒有人注意到第一個問題。而要回答這個問題，他認為必須瞭解 1603 年馬尼拉大屠殺事件之後的東亞海域局勢。但是關係到馬尼拉大屠殺事件，不免又衍生出幾個問題：事件過後有生存者嗎？即便有生存者，他們又去了哪裡呢？

經查閱 Blair and Robertson 編輯的 *The Philippine Islands*，陳老師發現，1603 年事件過後，確實有華人倖存者。此外，在張燮 (1574-1640) 的《東西洋考》中也提到有生存者的記載。而這些倖存者，依 *The Philippine Islands* 的記載，全被西班牙總督 Pedro de Acuña 送進排櫓船中服役，後來在福建官員出面斡旋下，馬尼拉當局才予以釋放。釋放的時間點，根據陳老師推測，大約在 1605 至 1606 年間。若李旦是這批馬尼拉大屠殺事件的倖存者之一，則對照前述李旦於 1607 年抵達日本一事，似乎也就十分合理了。因為在東亞海域的移動，往往需要等待季風來臨，才能出發前往目的地，因此在被釋放後的一、兩年內，李旦才出現在日本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排櫓船 (galley) 模型 (陳國棟老師提供)

至於李旦自言是馬尼拉當地華人首領的問題，經陳老師考證，則認為不可能。若然，早在 1603 年的大屠殺事件發生之前，李旦可能就被西班牙人處死，因為在 *The Philippine Islands* 中記載，在事件發生前，當地的華人首領就已先被西班牙人囚禁處死。當然，我們亦不能排除李旦在面對英國人時哄抬身價、自吹自擂的可能，只是仔細檢證後，恐怕李旦最多也不過是小股華人頭領中的一位吧。

在自由問答時間，幾位同學提出問題。例如，歐洲人早期殖民擴張階段，東亞海域世界中各股勢力 (包括華商、日商乃至當地土著) 之間的族群政治關係有何異同；李毓中學長則對陳老師近年一系列研究提問。陳老師隱然有重新書寫東亞海域史的企圖，他就自己所思所知回答，並且提到自己將會持續進行關於海盜、西班牙人、荷蘭人等幾個系列的研究。由於研究海洋史的人不多，而且許多知識知道的人可能不多，因此陳老師不斷提醒大家應該多聊天，也許自己追查多時、百思不得其解的問題，在其他研究同好的幫助下，就能迎刃而解。

海洋史沙龍素描

2009 年第一次的海洋史沙龍，就在陳國棟老師以淵博的學識帶領我們走訪十七世紀初的東亞海域，以及大家熱烈的討論中圓滿落幕。本次沙龍後半的問答和討論，充分讓人感受到，海洋史沙龍這種開放式的討論確實是個能夠讓師生拉近距離，增進交流機會的好所在。



▲陳國棟老師演講會場實況（攝於臺大歷史系會議室）

2009 年第二次的海洋史沙龍，則於 5 月 25 日邀請劉序楓老師主講「傳承與發展——日本近年的海洋史研究概況」。劉老師是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副研究員，畢業於日本九州大學，是中村質教授的學生，中村質又師從箭內健次先生。論輩分，中村教授是曹永和老師同輩，與臺北帝國大學有學術系譜上的關係，故劉老師實為介紹日本海洋史研究發展概況的最佳人選。

劉老師提到自己之所以會踏入海洋史的研究，完全是陰錯陽差。原本老師的興趣是元代的西域史，但到日本留學時，因為中村質教授提到長崎留有很多資料，除了日本古文書之外，還有很多漢文資料，只有日本

和西方人研究過，沒有中國和臺灣的留學生利用過，建議劉老師往這方面發展。此一建議，使得劉老師自此一頭鑽進明清海洋史的世界，直到今日。

劉老師認為，瞭解日本海洋史研究近況，對臺灣學者及研究生的未來研究和構想應有很大的幫助。由於日本的海洋史研究有很深厚的歷史基礎，即使在鎖國時期，日本人也收集了許多情報和資訊。除了學術傳統之外，近年來日本文部科學省（學術振興會）推動的大型學術研究計畫（Center of Excellence，簡稱 COE），也促進亞洲海洋史研究的盛況，同時出版了許多相關書籍。其中岩波書店 2008 年出版的《海域アジア史研究入門》，書中除了研究史的回顧和展望之外，還附有許多參考文獻，堪稱是掌握日本近年海洋史研究概況的絕佳入門書。



▲劉序楓老師（攝於臺大歷史系會議室）

關於日本海洋史研究的傳統，劉老師從德川幕府末期的海防意識危機開始講起，其中以林子平（1738-1793）的《三國通覽圖說》及《海國兵談》最為重要。然而，日本開始有計畫地進行海洋史研究，則應從臺北

演講摘要

帝國大學談起。臺灣是南進政策的中心，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的史學科就集合了許多當時日本一流的學者，因為日本政府希望透過歷史研究，為南進政策的合理化找到歷史的根據。因此，臺北帝大史學科與日本的海洋史發展有著很密切的關係。

臺北帝國大學史學科雖分為東洋史、南洋史和國史（即日本史）三大講座，但講座中的教授和學者都以海外交通史為專長。例如，東洋史講座教授藤田豐八（1869-1929）即是以東西交通史為主要研究領域；接任藤田教授的桑田六郎（1894-1987）亦是以東西交通史和東南亞史為其專長；國史講座的小葉田淳教授（1905-2001）也是以中日交通史和南島史為主要的研究領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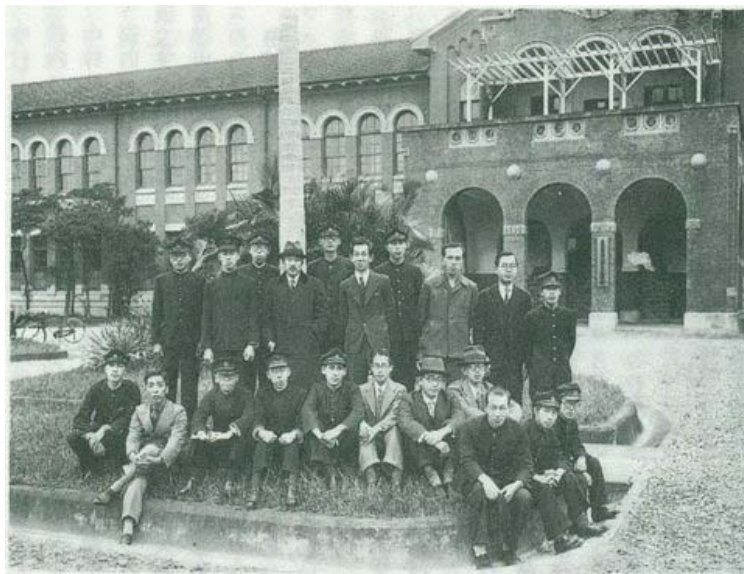
東洋史與國史都如此，遑論與海洋史研究最相關的南洋史講座。南洋史首任講座教授村上直次郎（1868-1966）專研日歐交通史，精通七、八種語言，讓當時身為副手的岩生成一教授感到無比的壓力（因為語言能力不及村上教授）。箭內健次先生是中村質教授的老師，他的主要研究領域為菲律賓史和南洋華僑史，足見臺北帝大實為當時日本海洋史研究的重心。



▲臺北帝大東洋史講座教授藤田豐八（1928年攝）及其眉批。（劉序楓老師提供）

▲上圖：臺北帝大首任南洋史講座教授村上直次郎，攝於1932年。

下圖：臺北帝大南洋史講座教授岩生成一，攝於1955年。（劉序楓老師提供）



▲臺北帝大史學科師生（1941年攝於文學院前）：後右方起第二人箭內健次、小葉田淳、岩生成一、移川子之藏、中村喜代三；中排第二人桑田六郎；第五人起青山公亮、菅原憲、宮本延人。（劉序楓老師提供）

戰後，這些教授回到日本。然而由於戰敗後的反省和馬克思主義生產樣式論的流行，導致日本國內海洋史研究沈寂了一段時日。但以村上直次郎、岩生成一為中心的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則將精力放在史料的收集和研究日本的對外交通關係史。戰後的日本海洋史研究方向，主要是以日本為中心的對外關係史。1980年代以後，則以海洋為媒介，將研究的觸角延伸到鄰近的東亞海域，強調地區之間的相互交流。

此一時期的日本海洋史研究學者，大部分都是研究國史（日本史）出身。亦有許多學會和研究會，其中以岩生成一為代表的「日蘭學會」最為重要；而近年大阪大學桃木至朗教授所領導的「海域アジア史研究會」，在會名上則已表明是以海域為主，跳脫出以大陸為中心的思考模式。

1990年代之後，日本的海洋史研究更加蓬勃，主要是受到法國年鑑學派史家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 1902-1985）所著《地中海》（*L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 à l'époque de Philippe II*）一書翻譯出版的影響。此書在日本除了十冊的全譯本之外，還有五冊的普及版。此後，日本的海洋史研究轉而研究區域之間的交流，除了國與國之間的政治、外交、貿易和交通史的研究，研究者更希望能突破過去以國家為中心的歷史研究觀點，注重海域內部的交流，與民族、區域的比較研究。

目前日本最主要的海洋史研究計畫是「東アジアの海域交流と日本傳統文化形成：寧波を焦點とする學際的創生」（東亞的海域交流與日本傳統文化的形成：以寧波為焦點開創跨學科研究，官方網站：

演講摘要

<http://www.l.u-tokyo.ac.jp/maritime/index.html>，2005-2010 年)，共有 137 名研究者參與，並有 36 個研究群，橫跨社會、思想、文化、生活等領域，其下還有東亞海域史研究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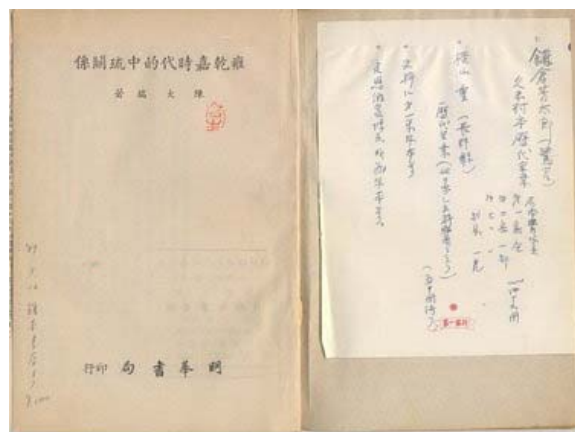
日本近年的海洋史研究，一開始是從對外關係出發，以日本為中心，由點開始慢慢連成線，再擴展成面。儘管目前臺灣的學術環境，不論人力、資源、歷史以及制度背景等，都與日本有差別，但仍可以日本的經驗做為參考。

臺灣學界的海洋史研究，大多屬於單打獨鬥，不似日本有眾多學會、研究會等組織，實為缺憾。劉老師期望海洋史沙龍能做為學術社群凝聚的開始，之後可以成立讀書會、研究會，一步步地發展。他也希望政府能推動像日本文部省的 COE 計畫，挹注更多經費，將各處人力集中起來。雖然教育部規定各大學要開授海洋史的課程，但效果不彰，在人才培育方面亦亟待加強。身為中研院人社中心海洋史研究專題中心的一員，劉老師感嘆臺灣的海洋史研究主要偏重於荷蘭時代，而且研究人才嚴重短缺，五十多歲的他，卻是該中心最年輕的一員。言談之間，不時流露出對於臺灣未來延續海洋史研究的擔憂。再者，依照目前臺灣的制度條件，並不容易像日本一樣，大量出版或編集海洋史相關的基礎史料集，如《日本海事史料叢書》、《大航海時代叢書》等，這在奠定海洋史研究發展的過程中，實為一大憾事。

劉老師的演講，不但有系統地介紹了日本海洋史研究近況，讓我們得以深入瞭解日本的學術研究概況，並進而審視臺灣目前的

學術現況。而且在精彩的演講中，亦讓人充分感受到日本學者嚴謹的治學態度。劉老師舉了一個例子，岩生成一和當時的學生中村孝志回憶村上直次郎教授在臺北帝大教導學生讀史料的情形，上課學生只有兩、三個，完全無法摸魚，奠定了學生紮實的史料閱讀能力。想必劉老師留學日本的情況，亦是如此。由於中村實教授是國史學的學者，對於史料有很嚴格的要求，劉老師曾與中村教授進行一對一的史料閱讀訓練，還跟老師跑遍九州各地做田野調查。而日本的師生關係，和臺灣也有很大的不同，例如，在喝酒聊天之間輕鬆談學問的方式，就和我們的學習經驗大異其趣。

透過劉老師精彩的演講，我們除了能從日本的研究汲取經驗，更需要思考如何讓臺灣的海洋史研究能夠往下扎根，並且能有計畫地擴大臺灣歷史學界的研究範疇。（圖文轉載自臺灣與海洋亞洲部落格）



▲岩生成一教授逝世後次年（1989），劉老師於東京舊書攤購得其藏書，扉頁有印章（岩生）及筆記。另同時購得蓋有「曹永和」印的《天工開物之研究》一冊，推測此書亦為曹老師所贈。（劉序楓老師提供）